

消费视阈下地方戏剧的范式转变及审美认同^{*}

张伟，詹向红

(1. 南京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93；2. 合肥学院 中文系，合肥 230601)

摘要：消费社会的到来创造了多元共生状态的文化形态，它在给传统地方戏剧的传承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机遇。地方戏剧必须在创作题材、传播途径及方式、发展空间选择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内部范式的转变，才能适应消费社会的需要，增强社会的审美认同。

关键词：消费；地方戏剧；文化形态

中图分类号：J80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398(2012)01-0069-05

引言

作为一种典型的精神文化，戏剧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戏剧创作者依据对现实生活的积累、加工、改造，来反映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风范的精神生活的产物。中国由于地域辽阔，文明传承历史悠久，其戏剧形态的地域文化色彩相当明显，形成了数以千计的地方戏剧种类，这些地方戏剧大多是具有民族审美意识和地域文化审美特征的精神遗产和文化遗存。在民族文化保护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今天，作为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的古老的地方戏剧却日渐式微，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地方戏剧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已变得模糊而遥远。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了消费社会，在从以“生产”为中心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消费作为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文化结构，成为一种象征个体社会身份的价值符号和新的意识形态，人们在消费中获得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获得了某种自我想像，同时也标明了个体自身的阶层地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当下日常生活的基础。“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性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1]消费主义所倡导的欲望宣泄造就的肉身快感和仿像审美造就的视觉晕眩，加剧了对传统文化阵地的蚕食和掠夺，传统的的地方戏

剧更是在当下社会转型的思想大潮中举步维艰。受众群体日渐稀少，传承创新异常困难，发展方向模糊等等困扰着坚守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地方戏剧的传承者。在西方文化、大众文化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消费社会，地方戏剧怎样应对这些新文化范式的挑战和挤压，是被动退缩从而在日渐式微的发展态势中放弃自身的话语权甚至生存权，还是在认同其他文化艺术形态的过程中，对自身的传统范式进行新的建构；在“文化输出”的大旗下对自身的存在进行整合，在传统的表演形式与当下的时代气息之间建构对话，从而在新的社会语境下获取具有时代意义的话语权，在这两者之间的选择应该是毫无悬念的。

事实证明，在消费主义的新语境中，地方戏剧进行自身的范式转变从而获取新的生存空间已不乏成功的案例，如发源于东北的地方剧种“二人转”这种表演形式现今已跨越了地域，获得了大众的审美认同，也给当下的地方戏剧艺术形式带来了更多的启发。诚然，地方戏剧艺术形式是民族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逐渐积累衍化发展而成，它积淀的文化内涵十分深厚，内在的审美意蕴也非常丰富，保持其经典的艺术价值并在其基础上对其传统的范式进行必要的转换，在日渐严峻的生存空间态势中主动出击，超越地域设定的审美界限，获取全民族的审美认同，这是当下地方戏剧在消费语境中，为获取话语权甚至生存权所必须采取的应对策略。

收稿日期：2011-06-29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资助(AHSK07-08D137)

作者简介：张伟(1979—)，男，安徽庐江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合肥学院中文系讲师；

詹向红(1963—)，女，安徽桐城人，合肥学院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硕士生导师。

一、对经典母题的坚守以及叙事题材的时代化

文明的传承是以不同文化形态的建构、发展、嬗变为载体的,文化不仅是一种物质承载,更是一种精神和社会现象。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一种极具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形态,融合了各种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地方戏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共生形态下的一个分支,自然也体现着富有民族特质和生命精神的存在价值,其汇聚了几千年先民提炼传承的民族性格,无论是戏剧文本,还是舞台演出、服装道具、表现风格等都是随历史的检验而择优传承的。题材是地方戏剧生存发展的根基,它是地方戏剧舞台演出的载体和灵魂,选择最富表现力,与接受群体生活实际息息相关的题材是地方戏剧拓展接受群体、增强生命力的关键。作为典型的地方戏剧样式,黄梅戏对传统题材的传承拓展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黄梅戏原名黄梅调、采茶戏,是18世纪后期产生在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以黄梅采茶调为主、以民间歌舞为基础发展而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在二三百年的发展进程中,黄梅戏吸收了汉剧、楚剧、高腔、采茶戏、京剧等众多地方戏精华,凭借着丰富的情感表现、优美动听的唱腔、融入生活现实的表现题材以及载歌载舞的舞台表演,成为安徽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并广泛流行于安徽沿长江两岸以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吉林等省市,其影响和声誉还远及中国港澳和东南亚一带。

刘师培认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2]。由于所处的地域不同,孕生于不同地域的文化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吴楚文化特质孕育了黄梅戏独特的抒情风格,其生动、轻松、活泼的南音风格致使唱腔柔婉清丽、活泼自然、抒情传神,具有典型的南方“柔性”之美。但就戏剧而言,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虽然其表现的艺术风格和表演形式不同,其戏剧表演所承载的母题都具有一定的共性色彩,众所周知,现存的大部分地方戏剧都是与农耕社会相伴而生的,都属于典型的农业文化形态,由于他们孕育的土壤具有相同性,其表现的母题就必然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弘扬爱情、表现正义、彰显孝道等等成为地方戏剧创作与表现的生生不息的经典

母题。

以黄梅戏为例,黄梅戏中有很多曲目是表现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其中一些曲目成为弘扬美好爱情的戏剧经典,如备受人们喜爱和传唱的《天仙配》、《牛郎织女》、《女驸马》等,在这些曲目中,被封建礼教所压制和束缚的爱情获得了释放,追求爱情自由、反抗情感压制成为戏剧创作者和戏剧接受大众产生共鸣的基点,正因如此,这些经典的曲目才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在被接受的过程中,创作者和传承者又不断对其进行理想化的改编,从而更易为大众接受喜爱,黄梅戏的接受者也正是在传唱这些曲目的过程中,表达了内心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和对现实生活中情感被压制的不满和反抗。值得一提的是,在黄梅戏的很多曲目中,彰显孝道也是一个贯穿其中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母题,如《慈母泪》、《天仙配》等,这种母题的存在与传承,为黄梅戏曲目在封建社会文化压制的现实环境中进行传播提供了存在的借口,同时也是儒家思想在地方戏剧表演中的渗透和折射。

走民生化道路,与时代生活紧密结合,反映并折射出具有时代生活气息的现代场景,在传承经典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母题的基础上,扩大戏剧题材的表现范围,是地方戏剧在消费社会进行范式转变的必由之路。黄梅戏在传唱的过程中率先作出了尝试,其采取了2种发展策略:(1)对我国的一些文学经典作品进行戏剧改编。近年来,不仅对优秀文学作品及文学经典《红楼梦》、《孔雀东南飞》、《长恨歌》、《孟姜女》、《徽州女人》等进行了戏剧改编,而且对外国名剧,如朝鲜的《春香传》以及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等剧目也进行了黄梅戏改编的有益尝试。(2)直接创作了具有时代意义、反映时代生活的新版黄梅戏剧目,如《柳暗花明》、《遥指杏花村》、《山乡情悠悠》、《木瓜上市》等等,都是紧紧把握对经典题材的坚守并在此基础上扩大了戏剧题材的表现范围,打破了传统剧种千篇一律的表现形式,像黄梅戏这样的地方戏剧艺术,才会不断拓展其接受群体,扩大其影响力。

二、接受范式的嬗变与都市化发展策略

地方戏剧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出一条适应时代要求的新路子,必须加速完成转型,使其从农村文化和城镇文化转向都市文化,使地方戏剧植根于现代都市,植根于都市的知识阶层。众所周知,地方戏剧大多是农业文化形态的产物,是伴随着千百

年的农耕社会而产生的意识形态。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使得萌芽于其中的戏剧形态深深扎根于这种农业社会的土壤之中,耕作于农业经济形态的普通民众是地方戏剧的接受主体,满足这种接受主体的欣赏习惯,反映他们所熟知热爱的日常生活是地方戏剧获取生生不息活力的动力所在^[3]。

然而现代社会的发展,改变了地方戏剧千百年来的生存环境,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城镇化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使得大量人口从世代栖居的农村搬迁到城市,再加上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社会流动人口急剧增加,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年群体在各城市间流动,农村现居人口急剧减少,特别是有知识的年轻一代,已不可避免地远离了农村,传统意义的地方戏剧接受群体的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革,这种变革的结果使得建筑在这一社会结构基础上的文化样式必然要发生变化。地方戏剧也不例外。

地方戏剧的都市化进程符合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在人类历史上,文化的真正大发展都是在城市出现和发展之后,只有城市才有文化的强大创造力。同样,地方戏剧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化,那种把地方戏剧的本土化理解为乡村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地方戏剧的本土化不应该是一成不变,它本身就包括城市化的进程。地方戏剧内在结构中最重要的不是其萌生与发展的地域环境,而是它所服务的并与其有着深厚情感的地域接受群体。地方戏剧的现代化和都市化,与充分尊重和发挥民间的戏剧创造力以及戏剧为乡村和农民服务并不矛盾。其实,很多地方戏剧在发展的历史中都有过城市化的经历,京剧是这样,黄梅戏也不例外。以黄梅戏为例,回顾黄梅戏的发展历程,如果从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首演整本大戏或者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拥有正式演出班社计算,黄梅戏才走过短短100多年的时间。

早期的黄梅戏是与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社会一样,属于小农经济下群众自娱自乐的一种艺术形式。这一时期的黄梅戏还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明形态的乡土戏剧,“农闲时唱戏,农忙时歇戏”这种季节性半职业性演出形态是其基本的演出模式。农民和手工业者构成了黄梅戏舞台演出的主体,同样也是以农民、手工业者为主的普通群体构成了黄梅戏的接受客体,他们通过黄梅戏的传唱进行交流和沟通。黄梅戏凭借这种农民演、农民看、演农民的典型

“草台班”演出模式在农村立了足、扎了根,并逐渐向城镇施加影响力,拓展其生存空间。在吸收了当地民间艺术、方言及地方曲艺之后,在县域、乡村发展初具规模的黄梅调就开始进一步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1931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数十年不遇的洪水,怀宁石牌汪洋一片,不少艺人随着灾民涌入安庆市区^[4],走进了当时安徽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为了赢得城市居民的喜爱,黄梅戏的表演者对黄梅调不断改良,在拥有乡村市场的同时,又打开了城市市场的大门。这次城市化道路的探索以及取得的成功,使黄梅戏的影响力大增,传唱的范围更广,形成了它诞生以来的第一次高潮。同样,在1952年11月黄梅戏来到上海,参加观摩演出后,这个一度被称作“黄梅调”的安徽地方小戏以其幽默诙谐、朴实率真、追求真善的个性魅力在上海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它使更多的民众和群体认知、认同、熟悉并喜欢上她,从而得以逐步向全国拓展并最终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开始被人们称作“黄梅戏”。据当年统计,全国共有黄梅戏剧团13个^[5],集中分布在安徽省,黄梅戏又一次掀起了其发展历程中的高潮。戏剧都市化是中国戏剧摆脱当下困境的重要选择。中国戏剧是附着在中国文化的大土壤上的,而整个中国社会正在迅速地完成它的现代化和都市化进程。

现代中国城市化的比例越来越高,曾经以宣传农业文明作为背景的戏剧形态,它必然要附着在时代的躯体上前进。这不是戏曲自身自作多情的选择,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整体转移。戏曲必须适应,否则必然被淘汰^[6]。诚然,走现代化、都市化道路,是当今语境下中国地方戏剧关乎生死存亡的重要抉择,黄梅戏在这方面的探索及其所取得的成功,恰好为其他姐妹戏剧的现代化和都市化进程提供了范例和借鉴。

三、传播载体的多样化和叙事空间的拓展

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类神奇的创造力在推动社会前行的同时,也给自身造就了日新月异的新世界。当今社会,信息传播技术迅猛发展,媒介已经变得日益普及,甚至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无所不包的网络、频道繁多的电视、随身携带的手机、MP4,再加上琳琅满目的报刊以及铺天盖地的广告和移动媒介等等,一个媒介化的社会已成为当下的事实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被媒介信息所包

围。依托大众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信息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速度更加迅疾,其内容含量也更趋丰富。各种审美信息也依托电子媒介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媒介传播的各种审美表现形式中,图像无疑是一种最易接受的审美形式,它主要诉诸视觉,创造并呈现逼真的形象,对接收者而言,他不需要深厚的知识积累,也省略或简化了理解、想像和联想的信息传递过程,审美感知变得相对简单,而且极易诱发接受群体的美感共鸣,这是人们普遍偏爱视觉形式的主要原因。随着媒介技术尤其是图像技术数字化的进一步发展成熟,图像叙事日益普及,图像自身的建构也日趋精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社会的到来使得消费文化开始成为主导文化。大众媒介在受到消费社会推动而迅猛发展的同时,更是生成和传播消费文化的主导力量。

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在改变社会生活面貌的同时,也冲击着地方戏剧的传播方式和接受形式,视而不见漠然处置只能使自身与时代的距离更为遥远,传统戏剧表演的舞台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下人的审美需求,仿像造就的视觉晕眩和审美快感冲击着大众的娱乐感官,生活节奏的加快更不容大众坐下来细细品味这些遗存的国粹经典,只有走下传统的舞台,接纳新的媒介形式,在新的传播媒介的推动下,主动进行自身的范式转换,才能在审美生活化的语境中寻找到一条合适的生存发展之路。黄梅戏做到了这一点。

掌握时代最新的传播手段,黄梅戏依托影视来建构自身的发展模式,大范围、高频率地占据视听空间,这是黄梅戏之所以能从偏居一隅的地方戏曲,迅速成长为深受受众喜爱并产生重要影响力的剧种的重要原因。1956年,第一部黄梅戏影片《天仙配》公映,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就创造了国内放映15万场,观众达1.43亿人次的奇迹^[7]。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给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带来了挑战,更带来了机遇,面对新的文化消费方式对传统艺术的挤压和碰撞,黄梅戏充分利用现代化的高科技传播手段,借助现代影视技术来进行自身的范式转换,扩大自身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拓展生长空间,使得受众群体无论是在“斗室文娱”、“居室文娱”时,还是在“广场文娱”中,都能感受到黄梅戏的存在,从而加深对黄梅戏的了解和接受。

当然舞台与荧屏之间是有距离的,演员要从舞台上走下来,进入摄影棚和外景地,由原来面对观众改为面向镜头施展表演才能,电视工作者则要潜心

研究黄梅戏艺术,直接参与再创作,“电视人”成了黄梅戏艺术向前发展的新生力量。通过电视荧屏提升黄梅戏品牌的艺术价值,给电视制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电视人”和“黄梅人”携手合作,成功地拍摄了多部电视剧。1984年,韩再芬因主演黄梅戏电视连续剧《郑小姣》而一举成名,现已成为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20世纪90年代后期,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戏剧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借助现代传媒,戏剧艺术摆脱了舞台演出的束缚,十分快捷地传播给受众,现在只要在网上搜索黄梅戏,就很容易看到中国黄梅戏网、黄梅戏故乡网、黄梅戏在线、黄梅戏爱好者、安庆黄梅戏艺术文化网等一系列专业网站,通过这些网站,可以了解戏曲知识,欣赏戏曲艺术,传播戏曲信息,探讨戏曲规律等。可以断言,黄梅戏能够从一种并不知名的乡间小戏一跃成为享誉世界的全国五大地方剧种之一,大众传播媒介功不可没。

踏入大众传媒的轨道,黄梅戏进入了广阔的市场,也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传统的舞台演出的局限被打破,其生存发展的空间进一步得到拓展,其表现的戏剧题材也随之扩大,原本舞台演出受限的内容在新的传播媒介的推力下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荧屏媒介采用实景拍摄,突破了戏曲传统舞台媒介的时空局限,将舞台上无法表现的复杂时空关系以及叙事线索引入黄梅戏的创作,黄梅戏中传统的“实”与“虚”的关系在新的媒介中得到重构,其表现的舞台能够向更广阔的生活空间、更鲜活的真实世界延伸。同时,大众传媒推力下的黄梅戏演出使传统演出的不可复制性被打破,戏剧影像作品的复制变得轻而易举,现代非线性的欣赏模式取代了传统的以时间为线的线性欣赏模式,受制于时间、地点、天气等客观因素的传统演出在新的传播媒介的作用下变得更加灵便自由。另外就传承方式来说,由于传统舞台演出受制于地域条件的影响,传承范围过于狭小,其基本的方式就是口传心授的师徒传承,其传承的范围和效果都很有限,而新的媒介颠覆了传统的传承模式,音像制品、荧屏表演都是最好的老师,其传承的范围和效果以及影响力都是传统传承模式难以企及的^[8]。

四、结论

黄梅戏在历史和现代的进程中始终探索着自己的发展途径,在消费社会创造的发展机遇面前,其更是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或许其探索的脚步还略显

稚嫩,还有很多的缺失和不足,但其在传播方式、欣赏方式和接受方式上引起的变革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无论是题材的拓展,还是表现形式的重构,它对地方戏剧在新的社会语境下的范式重构和空间拓展都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和借鉴,地方戏剧只有适应新的语境,与大众传播媒介紧密结合,在坚守自身经典

艺术内涵的同时,善于汲取具有时代意义的生活题材,熟悉产业化的发展模式,加强广泛的营销和宣传,在适应新的传播媒介的同时,进行自身范式的转换或重构,只有这样,地方戏剧才能走出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

参考文献:

- [1] 迈克·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 刘精明,译. 上海:译林出版社, 2000: 165.
- [2] 张正明. 楚文化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252.
- [3] 胡耀池. 开创地方戏剧新天地——繁荣发展地方戏剧理论研讨会发言综述[J]. 民族艺术研究, 2007(1): 23-25.
- [4] 安徽省艺术研究所. 黄梅戏通论[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0: 476.
- [5] 陆洪非. 黄梅戏源流[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5: 26.
- [6] 卢巍,罗松. 直面当代戏剧之命运[J]. 中国戏剧, 2004(1): 6-18.
- [7] 李明毫. 大众媒体与消费时代的黄梅戏传播[EB/OL].[2006-11-01]. <http://lmhxueshu.bokee.com/5817829.html>.
- [8] 卓光平. 传统戏曲的反思与转化——论鲁迅的戏曲观[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6): 61-68.

On the Local Dramas' Paradigm Shifts and Aesthetic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ZHANG Wei¹, ZHAN Xiang-hong²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fe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The arrival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has created a multicultural symbiosis, which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local dramas for their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The local dramas must be transformed in the themes of creation, transmitting methods, space choice of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other internal paradigm aspect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enhancing the aesthetic identity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 consumer; locality drama; culture formation

(责任编辑 李世红)